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环境与社会互动 问题研究

沈殿忠 著

沈殿忠文集

沈殿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环境与社会互动 问题研究

沈殿忠 著

沈殿忠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与社会互动问题研究：沈殿忠文集 / 沈殿忠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ISBN 978-7-5097-3658-6

I. ①环… II. ①沈… III. ①环境社会学-文集
IV. ①X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3865号

·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

环境与社会互动问题研究·沈殿忠文集

著 者 / 沈殿忠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丁 凡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陈 颖

责任校对 / 王伟平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658-6

定 价 / 128.00元

印 张 / 32.25

字 数 / 534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编委会

主 任 鲍振东

副主任 曹晓峰 孙洪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凯旋 卢 骅 吕 超 孙 航 牟 岱 李志国

李劲为 宋 扬 张天维 张洪军 张献和 陈 萍

陈 爽 金 哲 梁启东 廖晓晴 薛 勤

作者简介

沈殿忠，1950年生，1968年参加工作，1980年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1995年担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现为二级研究员。曾任三届辽宁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法制委委员，农工党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农工党省委副主委，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省社会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十余家单位特邀监察员或社会监督员，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等多项职务。



多年来，在环境社会学和统战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环境社会学”，主持完成一系列世界银行贷款省内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社会评价和公众参与课题，完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国家环保局共同组织的大型丛书项目“人与自然百科”，主持完成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研究”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项目“中日两国环境保护的比较”、“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日本侨民在中国”等。正在着手准备个人“全集”（指以往全部论著文稿的结集），初步统计约1500万字。

1993年以来相继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委省政府表彰命名的“省级优秀专家”、“省五一劳动奖章”等一系列荣誉。

总 序

时值壬辰，辽宁社会科学院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五十年征程。经过精心策划和编排，“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终呈其面，令人欣喜，从中不难窥见中国学术传统的映像和传承，感知社会科学工作者栉风沐雨、砥砺琢磨的艰辛劳苦，雄立潮头、凯歌行进的激情与欢乐。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意义重大。自有人类社会起，就开始了各种方式的对社会规律的探索，以叩问社会之道，寻求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些探索已成为人类探索自身的一部分。社会是人的活动域，有关这一场域的属性、构造、关系、机能等的规律性的研讨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内容。康德生动、精准而有趣地表述了自然、人、社会的关联：“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人类结成社会以解决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或者说人类以社会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自然之属。从那一刻起，社会就作为人的结构的一部分而存在，它和人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以至于建设社会就是建设人自身，研究社会就是研究人自己，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寄托着人类的希望。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社会关联着人类的未来，在马克思的理想中，“人的社会”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理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类未来的期许成就了社会科学研究充类至尽的学术积淀，成就了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光昌流丽、兴旺发达。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学理传统，即要着眼于基础理论的



研究。人类社会代有其变，但有着基本的规律贯穿其间，对这些基本规律的研究延续在数千年来对人类社会的体认之中，其成果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深厚传统，凝聚为人类文明的珍贵积淀，影响着各个时代、各种体制下的社会建设。“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周书·泰誓》）。这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普世追求。分门别类，彰显根本，对社会之道的追问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淀与守护，探索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和进步理念，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它的时代性，它由此建立起有差异的合法性、权威性，建立起与所处时代的血脉关联，并以此回应时代之问。时代精神赋予了哲学社会科学分析现实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必须与时代一同发展，葆有向新而在的敏锐性、先锋性，敏锐地在学理传统中整合进时代的质素，以此推进社会的积极发展。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要处理好八种关系，即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求真与务实的关系、动机与效果的关系、调查与研究的关系、科研与科普的关系、有为与有位的关系、治学与修身的关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做好本职工作，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又是一项脚踏实地的事业，它的理论不是面向空中筑楼阁，而是朝向坚实大地的实践结晶，呈具象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个人类共同体之中，与具体的生活、建设、发展相联结。它的应用性体现在作为社会管理、政策制定的智库，为具体的社会发展服务。由此，社会科学研究要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光荣传统。事实上，倡导调查研究是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固有的学术传统，早在 20 世纪初，中国大地上开展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孕育了现代形态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其卓越的成果不仅构架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架，而且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依据。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必须在调查研究中切实致力于发现、认识并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把自己打造成党和政府的智囊团。这是它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任何一种脱离了社会现实和应用的社会科学都是没有作为、没有生命力的。

辽宁社会科学院起步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1962 年，其前身是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迅速发展于改革开放之后，进而蔚为大观。五十春秋，筚路蓝缕，薪火传承，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奉献了弥足珍

贵的学术成果，并作为辽宁省委、省政府的智囊团，为推动辽宁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在此过程中，造就了一支学有专攻、术有所长的学者队伍，涌现出一批学术精英人才。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的“十一五”时期为例。辽宁社会科学院共完成学术成果 3500 项，出版著作 104 部，发表论文、研究报告 3266 篇，有 236 项成果获胡锦涛、李长春、刘云山等国家领导人及省部级领导批示，总字数达 5056 万字。诸多成果不仅显示了特有的学术价值，而且被转化为新政策、新举措付诸实施，带来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关专家成为辽宁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经济、金融学、社会学、民俗学、中国语言文学、东北边疆史地史、明清史、东北近现代史、区域经济学的学术带头人。

列入首批“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著作的作者，均为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勤奋钻研，成为享有盛誉、颇具建树的知名学者。将他们的成果结集出版，对于积淀学术文化、加深学术积累、典藏学术精品乃至传承中国学术传统、打造具有地域风格和特征的学术流派、彰显辽宁社会科学院学术风范，无不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支“学者文库”作者队伍中，未来无疑还将有更多的加盟者。

展望未来，刚刚踏入“十二五”时期的辽宁社会科学院，志在通过五年的努力，建成体制完善、机制灵活、人才聚集、学科布局合理、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在国内位居上游水平、在辽宁省内具有权威地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研究机构，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和传播中心、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战略咨询服务中心、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和信息交流中心、地方党委与政府名副其实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辽宁社会科学院因时而生，为民而谋；孜孜以求，唯兴国以为宏志。共襄五秩盛典，无不鼓舞欢欣，豪情满怀。往事可追，前程在望。感慨系之，谨以为序。

纪世英

2012 年 7 月 6 日

代自序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三个价值评价”的思考

1. 讨论“三个价值评价”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最近，我对于自己的“40 年研究”及其履行社会责任问题，做了一些思考。对此，我首先对一些引起我思考的“前因”表示感谢！这个感谢是发自内心的真话吗？是真话。当然，开始有些不平静，因为“前因”中的个别言辞尖刻一些。但是，我很快就想通了，感到这是一件好事。好就好在能够有一个机会，对我的“40 年研究”做一次反思和评估：一方面是我反思，同时也请估量我和观察、关注我的人们帮助我反思；另一方面是自我评估，但是自我评估有很多局限性，因此希望估量我和观察、关注我的人们从“第三方”的角度帮助、促进或者独立作出评估。这种事情，在信息时代加快发展、网络世界日益壮大、虚拟社会不断成熟的新世纪，不仅将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将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为“前因”引致的“后果”，确实很好。

进一步看，这一次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对几个具体问题的看法，更重要的：一是涉及科研工作的价值评价，二是涉及科研人员社会责任的价值评价，三是涉及科研工作与社会责任关系的价值评价，上述即为“三个价值评价”。这“三个价值评价”对于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尤为重要、突出、迫切、深刻，因此，不论讨论中的言辞是否粗鲁（在目前的网络环境中出现一些粗鲁的言辞也不必计较），由讨论引发的“三个价值评价”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必须要正视的问题，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不应该沉默的问题。



基于问题的重要性,我准备在个人博客即“沈殿忠的博客”(新浪博客)上陆续予以阐释,此第一号文,为开篇,也代为本书的自序。

2. 讨论“三个价值评价”是一个及时的选择

这里,我要对没有及时进行有关问题的讨论表示歉意。从我们这里有关讨论的时间看,始于2012年2月下旬,但是,我稍晚才在网络上看到。这里有一点客观原因,即我于2月20~23日去阜新市、朝阳市、凌源市,参加省政协一位领导有关我省消除绝对贫困问题的调研,24日又在省政协机关参加省直有关部门消除绝对贫困问题的座谈会。同时准备提交另一份有关方面的材料,题为“网络上对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的政治攻击是一个不能置若罔闻的问题”。接着,25日下午去石家庄,参加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一个会议,26日全天开会,当天夜里乘坐春秋的航班飞回沈阳,27日晨一点抵达,再坐机场大巴转出租车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两点半了。27日下午又有一个事先安排的讨论活动,结束后乘公交车回家,到了晚上打开电脑,浏览中看到有关网评,已经是27日夜里10点多了,稍作考虑决定还是表达自己对于“三个价值评价”的看法。

那几天里,我在紧张处理近期一些迫在眉睫的工作和参加一些不便缺席的社会活动时,对于如何回应网上有关的讨论,也挤时间做了一些思考。特别是有的社会活动对于我深入认识有关“三个价值评价”问题,也有重要启迪。例如2月28日参加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第五届决策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宣布的《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关于表彰优秀咨询建议的决定》,在受到表彰的2000年以来的60篇优秀咨询建议中,有辽宁社会科学院11篇,占全省的近20%。考虑到咨询委员的构成涵盖省市党政机关、大专院校、科研部门、企事业单位(刚刚组成的第五届决策咨询委员会院士就含20人),因此我院获奖比重是相当高的。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地位;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需要更多地或者主要是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能够有力地促进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3. 讨论“三个价值评价”是一个平等的选择

我对于有关讨论的实现,还应该感谢网络。这也是真心话,因为没有网络上的讨论,也可能没有对于我“40年研究”的估量了。当然,也可能有,因为前两届民主党派省级组织换届前,都出现对于我的估量材料。现

在，民主党派省委换届前后，又出现类似估量，可以理解。

但是，这一次对我估量的方式很好，好在网上，也在我作为民主党派省级组织负责人连任三届后不再提名了，可以少一些顾忌，多一些畅所欲言。以前的估量，反映到有关部门，我看不到，大家也看不到，莫名其妙。特别是上一次的估量，不是匿名，而是冒名，贻笑大方。

现在好了，把估量发在网上，我们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了。所以，不论人们对有关估量有何歧义，我是从心里感谢网络的，因为网络给我提供了一个同估量人对话的机会和切入点。

4. 讨论“三个价值评价”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网络上的有关估量东一榔头西一锤子，讲了不少话，稍作梳理可以看到，这些话虽然提及几个具体问题，但是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是“三个价值评价”，即科研工作的价值评价，社会责任的价值评价，以及科研工作与社会责任关系的价值评价。

“三个价值评价”关系重大。它不仅关系社会科学工作者个人的荣辱，而且关系一个单位及地区的声誉（因为我获得的荣誉涉及单位，如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涉及地方，如“省级优秀专家”、“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涉及全国，如“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一系列全国性奖励和荣誉称号），更关系到地方乃至国家社会科学体制的把握和走向。进一步看，“三个价值评价”也是困惑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多年的全局性问题。因此，抓住时机，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讨论，对于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顺利、健康、加快发展，是一件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事情。

5. 讨论“三个价值评价”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履职情况，例如将我作为讨论对象，作为讨论“三个价值评价”的个案，这是很准确、很合适，很有针对性、典型性、代表性、示范性及可行性的。

以我为例进行讨论，是促进“科研工作的价值评价”的需要。显而易见，选择我作为评价对象有一个好处，即我从事科研工作时间比较长。有的人提出这个时限是“40年研究”，我想了一下，这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算起的，至今确是40年，基本符合我的研究实际。虽然1976年10月前那个年代里，我写下尘封中的几百万字，有些文稿的时间还可以推前一些，但还是尊重“40年研究”时间的界定吧。而且，我目前的工龄是40余年



(从1968年算起迄今近44年),把我的工龄称为“研究龄”,还是比较客观的。

略微回顾,我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个月从县农机厂铸造车间进入县机关工作的,1979年初从县机关进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半工半读”(参加省社科院和省委党校合办的“全国性”的自然辩证法培训班,既作为学员,又作为工作人员,因此称为“半工半读”),1980年初正式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专业研究。迄今,我虽然在国内外的学术界没有轰轰烈烈、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从1995年开始担任地方社科院的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以来,至今毕竟已近18年了,还在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职位上连任至今。

同时,我先后担任一系列学术组织职务,这些学术组织任职对于科研工作评价,也是重要的参照。目前我的学术组织职务主要包括: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顾问、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省非公有制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省社会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省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信评委、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成员、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审组成员,等等。

可见,讨论“40年研究”的是是非非,对于相关一些单位和各个学术组织的工作都将是有力的促进。

6. 讨论“三个价值评价”是一个充分的选择

以我为例进行评价,不仅有利于进行“科研工作的价值评价”,更有利于进行“社会责任的价值评价”。其理由在于,我担任的社会职务比较多,主要涉及国家机关、民主党派、社会组织三个方面。当然,在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担任的职务均为兼职,实质上是履行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

我兼职的国家机关职务主要是:辽宁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省人大代表,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九届、第十届省人大大会主席团成员(1998~2008),省人大法制委委员(2000年建立法制委至今),等等。

我兼职的民主党派职务主要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农工党辽宁省委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副主委,省委参政议政委员会主任。

我兼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社会监督员职务主要是:辽

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监督员和人民监督员、省高级人民法院社会监督员、辽宁省监察厅特邀监察员、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省国税局特邀监督员、省工商局特邀监督员、省邮政局特邀监督员、省电力公司特邀监督员、省网通公司特邀监督员、沈阳铁路局特邀监督员、省司法厅劳教部门特邀监督员、省肿瘤医院等单位特邀监督员等等。

我兼职的其他社会职务还有：省委省政府第五届（现任）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省直劳模协会副会长、省社会救助协会副会长、省直工委“最佳实事”评委会委员（连续四届）、中国医大二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成员、解放军 202 医院生殖伦理委员会副主任、省道路运输协会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省国资委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等等。

这里稍作一点说明，我国的国家机关一共有三种：一是权力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二是行政机关，即各级人民政府；三是司法机关，即法检两院。人们熟悉的各级政协，不是国家机关。我国的合法政党一共有九个：一个是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八个是参政党，即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需要指出的是，我省 14 个市，一些市并不是完全存在八个民主党派组织的（国内其他省市的很多地方都类似），但是，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几乎各个民主党派组织的成员均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对于这些民主党派成员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评估，任何一种不恰当的做法，任何一种不合适的估量，特别是这种不恰当、不合适的言行，如果来自共产党组织的成员，不仅影响我院民主党派成员个人的发展，而且会影响新时期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

无疑，对于“三个价值评价”的讨论，必将给各有关国家机关、各有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推动和改进。

7. 讨论“三个价值评价”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以我为例进行有关讨论，特别有利于进行“科研工作与社会责任关系的价值评价”。原因在于我个人有明显的“先天不足”和“薄弱环节”，为此，我愿意主动交代如下。

首先，我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学历（当然更没有任何一种学位），不要说没有“海归”的桂冠，没有国内外各种全日制的证书，就连电大、函大、夜大、职大、自考大（还有什么大，请大家帮我想一想）的证书都没有，甚至高中、职高的学历都没有。我有生 62 年来，只得过一份小学毕业证书，但是现在一时找不到，不敢在数不清的登记表中填写“小学



毕业”，因为害怕别人说我是假学历。因此，我长期以来填写各种报表时，在学历一栏，或者空白，或者具体填写“初中二年”。但是，有的报表部门往往不经我同意擅自改为“初中”。所以，在打假过程中，如果有人发现我的报表假冒初中毕业，查处时一定要明确，此责任不完全在我个人。

其次，我这样一个学历白丁，竟然在1996年就被评为研究员正高职称，成为辽宁社会科学院目前在职人员中任正高职时间最长的人，还在职称分级时首先一批拿到二级（意味着在省内评职称走到顶点）。

最后，我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证书”是1993年获得的，不是后来的“一次性”津贴，而是“终生性”津贴，按月发，直到死。另外，还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5年）、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2002年）、辽宁省委省政府“省级优秀专家”（2006年、2010年）、中国反邪教协会“全国反邪教协会先进工作者”（2005年）、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先进个人”（2006年）、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2008年）等荣誉称号，还获得农工党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多项奖励，中央统战部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三项）、优秀奖（一项）共七项，国家人事部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一项，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省委统战部统战理论研究特别贡献奖两项，等等。

8. 讨论“三个价值评价”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目前有关讨论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不像有些网站、网页的“愤青”，一味辱骂，不摆事实，不讲道理，而是提出了很具体的问题。虽然，有关“三个价值评价”的讨论，将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不断深入的、不断扩大的、不断提升的讨论，但并不是漫无边际的抽象争论，而是要面对现状、联系具体、深入实际、把握本质、抓住要害、解决问题、推进工作、改变风气、繁荣学术、有利社会、有利公众、有利国家。

同时，我们看到，有关讨论涉及的具体问题，并不复杂，都很简单，很容易说清楚。例如，关于我在1998年“上山下乡”30周年出版的《思想沉浮录》这本书，暂不说它的价值，从人们关注的“科研人员考核”角度看，该书是我评为研究员正高职称两年之后出版的，和研究员职称评定没有关系；该书出版于1998年，和评二级研究员的年限也远远没有关系，因此，拿它说事意义不大。但是，我个人感到还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对该书

价值问题的深入思考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一批知青著述歌颂那个年代是“无悔的青春”，也有一些知青著述痛陈那个年代是“苦难的历程”。我的《思想沉浮录》同意“苦难历程”的判断，同时揭示那个年代里另一种“无悔的选择”。我在知青生活的八年里，虽然连一个生产小组长都没有担任过，但是在荒野上、土屋中、昏灯下苦读八年。《思想沉浮录》就是这八年生涯，特别是苦读生涯的原生态记录。其中，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系列思考，延续至今，以至现在社科院组织“学者文库”时，我的书稿主题依然是“环境与社会互动问题研究”，可见我的探讨一以贯之。

知青时期终结前，即粉碎“四人帮”仅仅一年多之后，辽宁社会科学院就给我寄来了“工作调转表”，深层原因就在于八年苦读。直接原因是，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时，我四处联系，得到了一个参加现已载入学术史册的“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的机会，从中国东北南大荒的一个小县城，第一次走进北京（“文革”年代的大串联中，我都没有到过北京，也就无缘“伟大领袖”的接见）。紧接着，又直接申请到参加“全国第一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研讨会”。会后不久，我就接到了辽宁社会科学院的商调表。而且直接调我进入地方社科圣坛，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背景，因为当年我的全部社会亲属关系中，没有一个股长（科长就太奢望了，那个级别的干部在我工作的县城里，都是部委办局负责人一级的领导）以上的干部，细究之，好像股长以下的亲戚也没有。正如我在该书前言中所讲：这里有“几乎其他所有知青日记里都没有的东西，即失望的苦难历程，求知的苦难历程，探索的苦难历程，思想的苦难历程”。

我现在还想补充一句：这本书是从我知青期间写下的约300万字文稿（含日记和读书笔记，还有一些专题文稿，如当年我写的批判血统论的那篇文稿就十万多字）中摘编出来的。现在看，这300万字可能是或者就是，整个中国知青历史唯一由一个人撰写并且保留下来的历史纪录。我希望有人能够发现打破这个纪录的个案（即在知青生活期间由一个人撰写并且保留下来的文稿），目前看可能性很小。因此，我准备公开完整出版。它的电子版已经打印出来了，但是，全书的框架迟迟没有考虑好。现在，讨论给了我一个灵感，这就是从这300万字的价值估量切入，进而完成全书框架的编排。至于该书出版后是不是“跟著作不挨边”，那都是“无所谓了”。



9. 讨论“三个价值评价”是一个据实的选择

讨论“三个价值评价”，不管结果如何，人们都会同意一个原则，即是否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不是一个猜测问题，不是一个推论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依据事实得出结论的问题。

首先，我要坦言相告：在我进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33年里，公开出版和公开发表的著作和文章总字数至少600万字，其中，大约500万字是在“最近20年”出版和发表的，另外的约100万字是在1979年至1990年的10余年出版发表的。

进入社科院的前10年，虽然也公开出版了个人独立署名的著作至少5本，但是各本篇幅不大，加上其他论著，总字数也就百万字左右。而“最近20年”，虽然有的公开出版的个人独立署名的著作篇幅也不大（如《透视神秘》那一本纯属一气呵成的个人独立署名的书，也就14万字，但是该书反对邪教的彻底性，及至后来有人评价我“反对邪教是从心里反的”，再及至我被评为全国第一届反邪教的36个先进个人之一，都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一点端倪），但是“最近20年”其他公开出版的由我个人撰写的著作篇幅较大的居多，因此总字数明显提升。

顺便说一句，上述我多次强调公开出版和公开发表，是因为我很少参与内部出版，但不是没有，例如，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一次有关东北亚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议的文集，就是我参与内部出版的。

同时提及的是，假如在“三个价值评价”中对我的估量有所偏失的话，自己也有责任：一是思想有些落后，不了解人们的新看法；二是活动有些脱离实际，不熟悉人们的新做法；三是工作有些不透明，如果我早一点利用网络和其他媒体向社会介绍和展示自己的研究情况，可能不至于使有的人发生大的误判。

10. 讨论“三个价值评价”是一个沉重的选择

所以沉重，不是因为讨论打破了我多年来平静的生活，而是因为讨论牵扯到昔日一些重要的科研工作和科研成果。其实，有些事好多年了，我一直没有解释或者没有机会解释，现在，讨论给我提供了解释的机会，我可以做一点简单的说明。

例如，20世纪90年代前期，有两本书是我分别争取得到的两个年度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的成果，第一本资助12万元，第二本资助10万元。请大家想一想，在90年代前期，这个额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需要走任

何后门就可以解决出版问题。这个额度，拿到今天，仍然可以各自出版两本书。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出版社“照顾”了我，而是我把这个选题给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会得到无条件的接纳（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也就是在出版合同上明确每本书的稿费均为当时全国出版行业统一规定的“高”标准，记得似是每千字30元）。进一步看，整个项目的策划，完全是在我、领事馆、王大路（后来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名人之一，已去世）三方之间进行的，不需要人们想象中的人情世故。

话到此，我还要说一句，20世纪80年代里，我独立署名出版的五本书，都同人情世故没有任何关系。其中，一本是出版社主动约稿。即使是约稿的老编辑，也是萍水相逢、君子之交，甚至有罕见的约写一本有关辩证法的书稿，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怜人惜才的缘故。另一本书是一位知名资深学者组织的科学方法论丛书中的一本。此外三本书同辽宁人民出版社都没有任何关系，分别是中国展望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的计划项目。成功的秘诀就是“在迷茫中不懈地摸索”，在摸索中没有经过今天名目繁多的任何一种考试，就幸运地走进了社科院的大门；在摸索中也结识了很多始终没有吃请的编辑，方法之一就是每写一本书就发出很多征询出版的信。特别是福建的那一本，我就是凭广发“征询出版信”成功的。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当年成功的自豪感可以永远留在心底。当然，如果当年的成功被人误解，也不能说完全出乎意料。至于90年代，是我多产的年代，原因之一是，我几乎连续五次争取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出版资助，这也是一个纪录，很难打破，如有打破该项纪录的信息，希望尽快通知我，以便学习。

我五次争取到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出版资助，其中三次是我主持，另外两次是合作，由别人主持，由此问世五部学术专著。其中两部有关侨民历史问题的专著，并不是“资料汇编”。其实，专著与资料汇编的界限再清晰不过了，如果把资料汇编说成是专著，顶多是一个低能的剽窃和抄袭骗局；如果把专著硬说成是资料汇编，那是什么呢？我相信公理自在人心。

对此，我想说：当年没有电脑，两部侨民历史问题的书稿是我一字字、一行行、一页页写出来的，除了有引必注的文字之外，每一句话、每一段话，都是我独立的创作。有些篇章至今令我“流连忘返”，每每暇时，不禁翻出重诵，每次重读，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发未来之浮想”。所